

《重新发现宋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重新发现宋朝》

13位ISBN编号：9787510826566

10位ISBN编号：751082656X

出版时间：2014-4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吴钩

页数：2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重新发现宋朝》

内容概要

有史学家称宋朝为“黄金时代”，有史学家则认为宋朝“积贫积弱”“太窝囊”。对于这个备受争议的朝代，作者独辟蹊径，抛开主流史观与文学形象，投身到宋朝的“现代化”细节中，像一个宋朝人一样去观察他们身处的世界：合作、互信的秩序，言论自由的氛围，“公天下”的“产权”观念，事无巨细的福利体系，严密的司法程序，相对健康的政治生态，“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时尚”的经营手段，丰富多姿的业余生活……将所有这些侧面组合起来，我们便会发现一个与我们以往认知完全不一样的宋朝。

《重新发现宋朝》

作者简介

吴钩，历史研究者，主要关注领域为古代的政制与社会生活，习惯以社会学与政治学为分析工具，对正史野稗、前人笔记所记录的古代社会、官场细节及其背后隐秘进行梳理分析。在《博览群书》《书屋》《社会科学论坛》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等刊物发表有多篇历史社会学随笔。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

书籍目录

第一辑 本该是“天下大同”的节奏

谁说传统中国是“低信任社会”？

看宋朝人再造社会

伶人讽政的自由度

宋朝也有城管与拆迁

皇帝也不敢强拆迁

宋朝的“福利国家”气象

宋朝是如何救助流浪乞丐的

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

宋朝没有“身边人”乱政

将皇权关进笼子里

第二辑 历史，不能预设立场

告诉你真实的宋朝衙内

陆游之子搞出来的一场暴力征地

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的宋仁宗

“公论，国之元气也”

惟有是非，故人得而议之

“官不修衙”

官邸制：现代的，也是传统的

宋人是如何防范发生冤案的

宋人对死囚的临刑关怀

发生在北宋神宗朝的一宗毒杀案

第三辑 中国古代无时尚？

平民可访烟花巷，官员不可挟妓行

公款吃喝的治理

商人的黄金时代

政府充当了开拓金融市场的先锋

涨海声中万国商

赈灾是一个系统工程

广告与商标

向市民开放的皇家林苑

花样繁多的体育运动

宋朝女性的合法权益

精彩短评

- 1、201505 有些材料重复
- 2、并不是系统地讲宋朝历史，而是类似答疑解惑的讲解一个一个的小问题。不过作者总是隐含的批评现在的社会，让人感觉作者的立场并不客观，有点“宋吹”了。
- 3、科普尚可
- 4、见微知著，细节去了解，可未必需要处处去比较
- 5、断断续续读完 对于了解宋朝市井社会风貌还是有帮助的 但是内容偏少了一些 宋朝在经济 民风方面确实比较“现代”的 虽然对外军力羸弱 但百姓在相对稳定的政局里头也能安居乐业吧
- 6、很短，其实还是可以看一下的，角度新颖。但是差不多就是整理归纳了一下宋人笔记，通过过度赞美宋朝来表达对现实不满，感觉每句话的潜台词都是现代社会制度还不如宋朝先进，作为一名宋吹一点宋人风骨都没学到，真不知道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 7、看了一半弃，挺无聊。
- 8、展现了宋朝不为人知的一面。对于朝廷分权和商业社会的评价，有点想当然地过高了。
- 9、宋朝，真好
- 10、好书，宋粉必看，透过宋朝看当下中国政治经济
- 11、如果可以穿越回去，我想士人应该最喜欢“刑不上大夫”的宋朝吧
- 12、只当猎奇书随手看看即可。没有深入的研究什么的。很多都是摘取历史书中的吉光片羽而凑起来的。典型的厕上读物。
- 13、还是读他那边《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吧，那本比较全面
- 14、这是个自由 艺术登峰造极的时代。每每翻看宋代绘画 都会止不住的惊叹
- 15、读到了不少有趣的史料
- 16、可以更加了解宋朝，通古喻今
- 17、这本书都是一篇一篇的小文章，很适合茶余饭后随便翻翻。宋朝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喜欢的一个朝代，很多方面，比如思想，自由，经济政策，政府职能，社会风气，真可以让当下的我们汗颜。作者很喜欢在文末说一句，当今如何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
- 18、对宋朝推崇备至啊。商业，国家福利，娱乐，司法，金融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好的制度。没有明清极度集中的皇权，政府机构对皇权有了很大的限制。
- 19、分析宋一代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救济福利体系、司法程序、经济金融政策及各种社会人文风尚（如习俗、商业、体育、女权），展现了一个施行仁政、相对高度“法治”的宋代形象及其“现代化”一面，对主流史观有所颠覆，现实指涉明显（如社会互信、土地物权、言论自由、社会福利、司法公正、公共财政、公款吃喝、权力制衡等）。作者为儒家辩护的立场鲜明，透露出的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对“仁为君主德之所止”的高度赞赏等观点，见仁见智，似有所局限。
- 20、也是一种视角，不过应该不够客观
- 21、以往看到说宋朝其实很繁荣，会有“商女不知亡国恨”之感。但从这本书可知，那些年的繁荣，并不是逃避和自我感觉良好，的确有约束皇权的政治制度，灵活逐利的经济政策和各种暗合经济学的想法，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出现的种种进化，促成并护航于这样的一个时代。
- 22、作者从制度的层面分析了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廉政，可以看出，宋朝已经有了君主立宪制的影子，皇权已经被关进了笼子里，虽然在执行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仅从制度来说是封建社会时期各朝代里最先进的。之后的朝代又走回了皇权一家独大的老路。
- 23、果然跟传统形象和积贫积弱的宋朝不一样，书中更多的从当时社会的民风政风等日常着手，少了军事。但不失为一本好书。
- 24、更多地是为了论点而引来的论据，难免有结论粗暴史料重复的毛病，主观很强，不过瑕不掩瑜/拿宋朝的两党制和美国的政治制度比很新颖
- 25、看过让人想多了解些宋朝，也些许感到遗憾
- 26、首先，重复内容多次出现，第二，私货严重，吹捧宗族制，过多夸大民间自治。不过后面提出的一些类似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类似观点还是讨喜的。
- 27、长了不少见识，确实角度比较独特。
- 28、写了不少之前不了解的宋朝政治制度纪事。史料运用上的确有重复，但瑕不掩瑜。

《重新发现宋朝》

- 29、宋朝的确是中华文明的巅峰时期，那时的中国已经很难说是封建专制社会了。
- 30、很一般
- 31、一般般，拖沓。不过还是分享了很多新信息
- 32、十分有趣的一本书
- 33、非常棒！
- 34、确实是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看待宋朝，也是更加贴近生活，贴近民间生活，这样的角度，也可以说是重新发现了宋朝的一些特点和习俗。确实，宋朝在文治，民俗上，有很不一样的特点，但是还是想说，缺少平衡的社会，很容易积重难返。
- 35、一个被忽略的朝代，看似弱小，却贴近现代，唯一？实在不多的几个不是农民起义的王朝更迭
- 36、每个观点都有史料做支撑，但是看到后面就发现挺多重复的，后面想一个事例体现多方面的情况，多么合情合理！能把史料和自己的观点融合在一起，说明作者对宋朝已经是信手拈来。至于，同意不同意书中的观点不重要了，作者通过对比来说明宋朝的优势，但是口气商榷，治学严谨大抵如此了
- 37、看起来很美的一个朝代
- 38、了解到了不少有关宋朝方面的知识，可以看出作者是个宋粉，有些内容还是略显主观。但不管怎样，宋代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成就，在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中毫无疑问，都是首屈一指的。
- 39、可惜内容太少，相信可写的不止这些。摘掉积贫积弱的帽子，重新认识那个令人向往的王朝，享国三百余年，岂是一句弱宋掩盖得了的？
- 40、感觉像一本仓促成书的作者感想。如果引注加上出处，配上文物图片，结尾不那么突兀或许是本还不错的能让人信服的扫盲宋史图书。闲来时读读，重新矫正教课书中教条刻板的赵宋朝历史知识。
- 41、我时常在想，要是宋把火药发挥到极致，什么金戈铁马，什么草原暴力中心，什么回回炮，都不会成为问题，天下必定我有。
- 42、一直关注他的文章，感觉他找的材料还有思路，如果用规范学术语言表达出来，文章发C刊没啥问题。挺有见识的
- 43、一直相信文华如此灿烂的朝代实力应该不差
- 44、以今视古，不要笼统的认为古之落后，今之现进。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在宋代，那时已现现代的诸多特点，有些富有现代气质的东西今已缺失。中国的古代历史，有很多东西是很优秀的，不比外国人出现的晚，不比外国人差，可惜的是元代至今而逐渐丢失掉，实乃遗憾。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如今一贯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中，是否也应该向我们自己的民族学习。
- 45、如果能穿越回古代去生活的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宋朝吧。毕竟这是一个相对宽容的朝代，经济文化达到一个高峰，宋仁宗这个前无古人的谥号也是接受儒家教育的皇帝能够获得最高称赞了，毕竟“仁”和“礼”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和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
- 46、有点片面
- 47、这本和《生活在宋朝》有很多内容是重复的，当是复习了一遍吧。
- 48、宋朝……一个伟大的时代～不知道比明清高到哪里去了！
- 49、举例很多确实让人对宋朝的社会文化耳目一新，很多内容都让我觉得这个宋朝挺可爱，不似教科书里的那么软弱无能。但是，作者的很多例子会重复使用好几次，影响阅读感受。还有，虽然读起来轻松，但是总感觉没有理清顺畅感。也能明显感受到作者主观上对赵宋的好感太强。
- 50、宋吹吹出新高度，我都有点害臊。

《重新发现宋朝》

精彩书评

1、《重新发现宋朝》的笔记-摘记

【第一辑】本该是“天下大同”的节奏

【宋朝没有“身边人”乱政】优良的国家治理框架，应当是君主象征主权，宰相执掌政事；而政局的败坏，都是由“身边人控制”引起的。宋代的国家治理框架，基本上能够保持“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二元分权，执政的法定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宰相团队手里。《宋史·职官志》这样形容宋代宰相的职权：“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宋会要·职官》也说宰相之权为“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虽然从法理说，宋代的皇帝保留着最后的决策大权，可以直接颁布圣旨，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宋代又形成了这样一种惯例：皇帝旨意“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宋之“二府”，指政事堂与枢密院，为宰相机构。宋代之所以无女主、外戚、宦官窃柄乱政，没有出现“身边人控制”的乱象，当然也应归因于国家能够保持着这样一个“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治理框架。

【将皇权关进笼子里】宋人心仪的“共治”政体暗含了一个“君主—宰执—台谏”三权分立的结构：君主是名义上的权源，“以制命为职”，一切诏书均以君主的名义颁发；但诏令不可出自君主独断，而是“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即由宰相执掌具体的国家治理权；如果政令“有未当者”，则由“台谏劾举之”，换言之，台谏掌握着监察、审查、司法之权，以制衡宰执的执政大权。三权相对独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虚君共治”并不仅仅是宋代君臣的理想共识，而且被认为是合乎“古今之常理”（自然法）、并以非成文宪则（习惯法）确立下来、有宋一代大体上一直在运行的政体。在这样的政体内，我认为，皇权已经被关进了笼子里。

【第二辑】历史，不能预设立场

【“公论，国之元气也”】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下誓约，要求赵氏君主“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官不修衙”】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官邸制”：现代的，也是传统的】“官邸制”，指的是国家为重要官员在任期之内提供住房的制度，……

秦汉时，国家实行的是“名田宅”制，……政府按照臣民的爵位高低，配给不同等级的住宅，很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分房。

唐代之后，国家不再对官员进行制度化的“赐田宅”，而慢慢形成了类似于现代西方国家采用的“官邸制”。唐宋的官邸制分中央官与地方官两套系统：在地方一级，州衙与县衙通常都划分为办公区（外衙）与生活居（内衙），地方官员及其家眷一般都居住在内衙。而在京师，中央政府则只向高级别的少数高官提供官邸……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官舍，还是中央高级官僚的官邸，所有权都归国家，官员只能在任期内获得居住权，离任则必须搬走。

宋朝立国后，中央政府在很长时间内都未建设官邸，京朝官只能自己租房子。……到宋神宗熙宁至元丰年间，朝廷便拨款在皇城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有资格入住“八位”官邸的都是副国级以上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三司使、三司副使、御史中丞（相当于议长）、知杂御史（相当于副议长）。……在地方一级，宋代的州县衙门通常都包含了居住区与办公区。……

“廨舍合一”的地方衙门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清的县衙都由办公区与生活区组合而成，冯友兰先生小时候曾经随父亲在县衙居住过（他父亲在晚清时署理过崇阳知县），对县衙的构造很熟悉。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进了（县衙）大门，绕过仪门，就是大堂。大堂前面两侧各有一排房子，这是县衙门的六房办公之地。……大堂后边，就是‘宅门’。这个称号表示此门以内就是县官的私宅。宅门进去，是二堂。二堂后边，还有三堂。进了宅门，往西边拐，就是花厅，是县官会客的地方。花厅西头，有一个套间，叫签押房，是县官办公的地方。花厅后边，隔一个院子，就是上房。母亲领着我们住在上房里面。还有厨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东边的院子里。这个格局和体制，大概各州县衙门都是一样。”中国古代实行流官制，官员离任，即交回房产。

不过对旗人，清廷则给予“福利分房”的特权，由朝廷“拨给官房”，即按照官阶高低向旗人分配房产，“一品官给房二十间，二品官给房十五间，三品官给房十二间，四品官给房十间，五品官给房七

间，六品、七品官给房四间，八品官给房三间。”这是清初的分配标准，后来由于财政不堪重负，标准才有所降低：“各处取到旗下官员，拨给房屋，各照旧例酌减。”雍正、乾隆年间，朝廷又开始推行市场化的“房改”，允许福利房交易，旗人可以通过缴纳首付与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得完整的产权。民国建立之后，旗人的住房福利特权才被废止，只有总统、内阁总理等高官由国家分配官邸，其他政府官员，则自购房或者租房，实际上即恢复了唐宋的官邸制。【发生在北宋神宗朝的一宗毒杀案】关于这起发生于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春夏之际的投毒谋杀案——陈世儒夫妇合谋杀害陈母案，前后审了一年多，直到元丰二年（1079年）九月份，御史台才宣布结案。这个案子审理期间渗入了执政党派的政治斗争。作者分析：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宋代的政治保持着明显的竞争性与制衡性，不仅表现为派系性的党争，还体现在‘执政-台谏’的二权分立结构上。在第三辑·公款吃喝的治理重提，见下。

【第三辑】中国古代无时尚？

【平民可访烟花巷，官员不可挟妓行】

谈到“春秋责备贤者”：中国古代的礼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与“春秋责备贤者”。按传统的伦理道德，寻花问柳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严格的礼法约束，这便是“礼不下庶人”的涵义。而官员，身为社会精英，当为万民表率，“君子（官员）之德风”，则应该接受更苛严的礼法束缚，此即“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只涉及正面，一旦从上层扩展到下层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其危害性一面就凸显出现了，显然偏离了其伦理理想。

【公款吃喝的治理】宋朝的政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大体上能保持着制衡性与竞争性，首先是政府一台谏的二权分立，台谏完全独立于政府，台谏官有点像现代议会政治中的议员。……另一个创造了政治制衡的机制，是表现为“异论相搅”的派系竞争。……我们现在知道宋朝的党争导致了很多恶果，不过也应承认，那是党争恶化的衍生品，良性的党争则可以创造一种政治压力，让执政团队保持警醒，以免被反对派抓住把柄。有完备的制度是一回事，制度能否得到执行则是另一回事。【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力量。……有人说中国儒家传统有抑制商业的习惯，这话其实不对，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富可敌国，……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孔子从来没有因为子贡的商人身份而对他有任何歧视，（相反认为他）是国家社稷的大器、良器。不过，后世的统治者，出于独尊皇权之需，对商人有可能与国君分庭抗礼的潜在力量很是顾忌，所以历代王朝几乎都制订了抑商、辱商、贱商的政策与法律（这一传统来自法家的思想），将商人列入市籍，视同贱民。宋代的一切制度优点都是尊儒的结果，对于王安石和他的变法，作者谈到的几处都是贬抑；在这里，则将抑商传统所产生的弊端归诸于法家（王安石亦是法家思想）。

在宋代儒家已经明明白白提出“四民皆本”之后，明末的黄宗羲还发现了“世儒不察”的情形，说明宋后的儒家思想与政经制度出现了一轮倒退，重新回到“重本抑末”的老路，所以才需要黄氏提出批评。

直到晚清，随着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大变迁，绅与商合流，在历史舞台集体登场，终于成为一支强大、独立的社会势力，并且从“孳孳求利”的理性经济人转型为自觉的社会新秩序构建者。在晚清绅商中，显赫者如“状元实业家”张謇，是立宪运动与地方自治的魅力领袖；平凡者也多以“商董”、“店董”的身份，成为主持市镇治理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晚清时代的地方自治、社会自治乃至国家立宪事业，都是绅商群体在发动、主持的。今日国有商人，却无绅商。【政府充当了开拓金融市场的先锋】与明清时期相比，宋代的金融业呈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政府充当了开拓金融市场的先锋。不管是中国最早的“银行”——抵当所，还是最早的“信托机构”——检校库，都是宋政府率先创办出来的；而为了对冲民间交引铺对证券市场的控制，宋政府也不是动用权力禁止交引交易——像明清政府一样，而是设立官营的“买钞场”进行市场调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王朝表现了其他任何王朝所不具备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质，宋政府比其他王朝的政府都懂得拥抱市场。【涨海声中万国商】宋王朝以开放的胸襟鼓励海外诸国来华贸易，也欢迎远人在华定居——我们现在都认为唐朝具有高度开放的气度，却不知道宋朝的开放性半点不亚于大唐，如果不是超过的话。

在北宋的汴京，有犹太人的聚居点，宋人将他们信奉的犹太教称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在泉州与广州等口岸城市，则生活着大批阿拉伯人，当地的姓蒲之人，很有可能便是阿拉伯商人的后裔。“蒲”即阿拉伯语“阿卜”的发音。广州还有很多来自东南亚与东非的黑人，他们是被蕃商

《重新发现宋朝》

当成奴隶贩卖到中国的。【向市民开放的皇家林苑】赌博，英文为Gamble，宋人叫做“关扑”，发音相近。到元朝时，还是这么叫。我有点疑心英语Gamble就是“关扑”的音译，由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入欧洲。【宋朝女性的合法权益】考察历史，宋代女性的地位绝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低，甚至可能在历代王朝中，宋朝女性的地位是最高的。法律与习惯法明确了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夫妻离婚，或者妻子改嫁，女方有权带走她的全部奩产。宋朝的法律也保护女性的这一权利。……宋朝之后，女子就丧失了这种处分自己财产的自由了。宋朝的法律也保护妇女主诉离婚的部分权利，……这是前所未有的法律对妇女离婚权的承认。不过……离婚需要丈夫写一道“放妻书”，作为法律上的凭证。唐宋时代的“放妻书”写得非常温文尔雅，来看一道敦煌出土的“放妻书”：

盖闻伉俪情深，夫妇语义重，幽怀合卺之欢，念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共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求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械恐舍结，更莫相谈，千万永辞，布施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年×月×日×乡百姓×甲放妻书一道。

……（这是）流行于敦煌一带民间通用的“放妻书”样本。夫妻好聚好散，相离不出恶声，正是文明的表现。关于缠足的考证观点：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缠足始于宋代，并被宋朝理学家推波助澜，从缠足可见宋朝妇女深受礼教压迫云云。但实际上，缠足并非发端于宋，唐朝时已经出现了缠足的风气，有诗为证：温庭筠《锦鞋赋》：“耀粲织女之束足”；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从唐至宋，缠足只是流行于上层贵妇和妓女群体的风尚，社会绝大多数的女性是不缠足的。另外，宋人的缠足，指的是将女性足部缠得纤直一些，叫做“快上马”，并不是明清时代那种变态的“三寸金莲”。

缠足的兴起，也跟宋代理学家毫无关系。我们在宋朝的理学著作中找不出任何支持女子缠足的言论。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理学家是明确反对缠足的。元代笔记《湛渊静语》说：“宋程伊川家妇女俱不裹足，不贯耳。后唐刘后不及履，跣而出。是可知宋与五代贵族妇女之不尽缠足也。”程伊川即北宋大理学家程颐。程氏家族直至元代，都坚持不缠足。南宋的车若水在他的《脚气集》中也提出，“妇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痛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缠足陋习的控诉。提出控诉的车若水可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再传弟子。

大体来说，宋代的缠足风气，只是出于上层社会病态审美的产物，跟西欧的束腰、今日的隆胸时尚差不多。到元代时，才出现了性别压迫的意味。如元人伊世珍的《琅环记》称：“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内，欲出则有帙车之载，是以无事于足也。”但在宋代，妇女并不受禁锢。补充：“宋王朝以前，但凡有钱有权人家，都可自己阉割奴仆。这种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纪，也就是宋朝开始後，才被禁止。”（柏杨《中国人与酱缸》）

2、《重新发现宋朝》的笔记-第42页

那么宋代政府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福利体系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大致而言，除了一部分来自赋税之外，还有几分来源：“内藏钱”，即皇室经费；公田的收入；常平仓的利息钱米；国营商业机构的收入，比如“榷舍钱”，即官设贷栈的租金收入。宋代有着相当发达的国企，“国企”红利用于国民福利，天经地义。

对比昨天我国教育司突击用钱，4万亿资金不知如何去用的新闻，真是越想越气！

另外昨天看知乎某关于厚黑学的论点的：社会的道德观念不停转变，到未来社会将是没有道德的。果然宋代千年之后的现在，国企红利只造福国企员工才是天经地义，养老只能靠自己。

3、《重新发现宋朝》的笔记-第57页

不能把两宋的书院只看作中国古代的私立学校，它的繁荣其实是理学传播的结果。

在11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传统和复古中去探索世界观、时空观和人生观，而不是从佛教中。

《重新发现宋朝》

在这些学派里，朱熹的理学逐渐显露出来，先放下他的学说是否比其他学派高明不说，理学的大力传播也是它在南宋获得广泛影响的原因，而同期的书院在各地如雨后春笋。有人统计，南宋书院的数量是北宋的6倍，是从唐到北宋500年的3倍。这些书院大多是理学为了传播学说所建立的。在历史机遇和他们自身的努力之下，理学在南宋末年被确立为正统，从而开启了对中国长达千年的影响。

科举的刚需

书院在北宋的开端，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试教育”。北宋立国，一派新气象，太祖太宗两朝吸取唐和五代的教训，既要削弱武将的权力，又要避免门阀士族把持朝政，其中一个设计就是，“宰相需用读书人”，重视科举取士。宋代的科举考试，降低了报名的门槛，士农工商出身都可以参加，录取“一切以程文去留”，卷纸都是遮住名字、誊抄过的，考官无法辨别笔迹和考生，完全依靠才华排名。太祖时每年科举只有几十人中举，到了太宗时，扩充到几百人，而且设定了皇帝最后主考的殿试制度。为了向上流动也好，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也好，这些改革让更多的读书人参与到举国选拔人才的活动中来。

可是，与改革刺激的更广大层面人民的科举积极性相比，宋代初期的教育系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宋代施行以禁军为中心的军制，中央政府要给庞大的职业军人发工资，财政压力很大，很难有多余的经费投入到学校建设和发展教育上。有人做过徽宗朝的统计，那是在王安石变法加大教育投入之后的数据，官学学生在16万到21万人，而每次参加科举的人数在40万左右，尚且满足不了科举取士的要求。

北宋的书院当然有教育民众、培养知识分子的目的，但时代机会是满足科举考试的刚需。即便从这个结果去往回推，位于现在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也是北宋的第一书院。主持过应天府书院的有宋代名臣晏殊、范仲淹，学生成绩是七榜中举56人，进士30人。《宋史》记载：“其中的宗度、许驥、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等皆践台阁。”而像胡瑗、孙复、石介，被称为“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

应天府书院创办于后晋，在第二代主持者戚同文的经营下，逐渐出名。《玉壶清话》介绍戚同文：“宋都之真儒也。虽古之纯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他自幼聪颖好学，“读书累年不解带”，但五代十国时局动荡不安，他立志不做官，专心教育。因为他精通五经，学问渊博，这里逐渐成为一个文化教育中心，“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宋史》记载的“儒厚长者”许驥，就是被经商的父亲送到戚同文门下学习，在太宗朝科举及第，与宋初名相吕蒙正齐名，为官至右拾遗、殿中丞。

戚同文去世之后，教学一度中断，1009年归为官方书院。两年之后，出身贫寒的范仲淹来到应天府书院读书。他在这里艰苦勤学了5年，考取了功名，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的关系并未结束，10年之后，他为母守丧住在应天府，时任应天府留守的晏殊，仰慕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邀请他在应天府书院执教。后代历史学家经常把范仲淹主导“庆历改革”作为宋代各种改革的萌芽，之后的《岳阳楼记》简直成了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在主持应天府书院的一年里，他已经为复兴儒学和吸纳人才做了前奏。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写：“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复明，徂徕有石首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

被理学尊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就是这时跟着范仲淹学习诗书，年仅26岁就中了进士，他后来讲授《易》《春秋》，“重义理，不由注疏之说”，开宋明理学的先河。“宋初三先生”的孙复，两次得到范仲淹的资助，还为他谋了一个教授《春秋》的职位。孙复后来被学术界最看重的就是《春秋》学。程颐在《回礼部取问状》：“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官的张方平，13岁进入应天府书院读书，天资聪慧和才华给范仲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仁宗明道二年，范仲淹与宋绶、蔡齐、范讽共列名举荐张方平茂才异等，授校书郎，知昆山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张方平曾经自述：“尝蒙范荐更台阁之要，久依户牖之严。”庆历改革时，张方平是范仲淹的得力助手。

《重新发现宋朝》

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非常勤勉尽心，《范文正公年谱》上写：“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他自己也在这时期完成了政治代表作《上执政书》，是后来“庆历改革”的蓝本。

儒学的复兴

宋代中期之后，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发展官学，书院作为应试科举的功能衰落了，但它的学术研讨功能却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因为北宋文化并不是继承前代、按部就班，而是个大变革。现在总有人说宋代文化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里解释，以复古传统为特征的11世纪标志着自5世纪以来对中国社会施加的高于一切的佛教霸权影响的结束。人类重新变成了在一个有限的和可以理解的宇宙中的人类，而只要对这种宇宙进行探索就可以理解它。11世纪中国精英界人物与其唐代先驱们之间的区别，犹如文艺复兴时代人物与中世纪人物之间的差异一样。

在宋代建国之前，距离“独尊儒术”已经有几百年了。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中认为，隋唐其实是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唐朝皇家拜老子为祖先，道教受到重视。玄奘从印度取回大量经典，后来禅宗也开始兴盛，而贵族官僚们的生活规范和政治理念又以儒家为基础。小岛毅研究，有资料显示三教的优先顺序在朝廷上发生争论，但是三教的重要性没有被否定。也就是说，三教并存的形式在唐代政治体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宋代打破了平衡，蓬勃的科举制度让士大夫、知识分子越来越有话语权。欧阳修开启了古文运动，他不但自己写古体散文，而且建议朝廷在科举考试中停用骈体文，鼓励写古体散文。为了实践主张，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做考官时，要求考生用古文答题，那次进士及第的包括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惠卿等，他们后来是北宋甚至整个科举史上的灿烂之星。这不单纯是一场文学革命，因为倡导古体散文的理由是，它可以不受修辞手段的规定和限制，自由表达政治和哲学观点。我们都学过欧阳修是受到韩愈的影响，韩愈在唐代就是高扬儒家传统，力排佛、道。

另外一个促使宋代知识分子提升儒学，恢复真正的儒学传统的动力在于周边国家不但在军事上对宋朝构成威胁，他们还都在学习和模仿中原文明，挑战宋朝的中原文化正统地位。西夏对佛教全面弘扬，尊孔子为文宣帝，修孔庙，开设小学、太学。辽国的佛教也很兴盛，雕刻的契丹大藏经却全是汉文的，对燕云十六州也是按照汉族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管理。辽国对于《新五代史》里将自己归为“夷”类并不接受，作为中华文化上的平起平坐，把赵宋起事经过附在辽国史里。女真人的汉化也是持续进行，到了金章宗时，甚至用秦代的“五德始终论”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他选择“土”作为金的德运，而这对应了宋朝选择的“火”，土是火的下一个循环。

在恢复真正的儒学传统，其实是确立“新的传统思想”过程中，宋代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充满了活力，理学、新学、蜀学等学派层出不穷，他们有的互相启发，有的前后继承，有的互为对手。承接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是，“新学”代表、王安石的改革。熙宁三年（1070），从隋朝开始持续了500年的进士科考诗赋，改考经义、策论。相应的，学校的教育要配合科举改革而重视经书解释。教材是王安石父子亲自执笔注释的《周礼》《尚书》《诗》三经。除了这些，王安石还做过其他的注释，继承他的新法党派中也除了很多注释家。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里写道：“北宋末期，从哲宗亲政时期到徽宗时代，这些注释书都是公认参考书。道学者虽也站在自己立场上做了一些注释书，但是即使在南宋后期道学系统学者的藏书目录中也并没有占据多数，由此可见新学影响力之大。”

其他的学派没有科举参考书这样的强渠道，大多依靠官学、书院、私学、家塾等教育机构来持续传播自己的理念。比如，“洛学”的程颢、程颐兄弟，他们的理论核心是“天理”，认为“理”是万物的统治者，不仅包含了自然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也包含了人伦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他们是王安石的反对派，仕途不顺，赋闲洛阳，在家里、嵩阳书院、龙门胜德上方寺、龙门香山寺等地讲学。他们的学生杨时，把“洛学”传到了南宋，曾经在南宋高宗的朝廷里侍讲经筵。“关学”创始人张载，年轻时受到范仲淹鼓励，从研究军事改为钻研儒学，建立起自己的系统。嘉祐二年，跟苏轼同登进士，王安石变法之时，辞官回到陕西横渠，立馆讲学。

朱熹的正统之路

《重新发现宋朝》

书院到了南宋，简直是蓬勃起来，在153年里，南宋书院总数是442所。南宋的书院不但数目大，分布也很广，覆盖了11个省。这种数量和广度，也可以看成理学在南宋传播的路线图，因为南宋的书院是伴随着这一学说而发展的。

对于特别重视体统的儒学知识分子来说，靖康之难的羞耻、北宋官员对女真人的投降和高宗朝廷的苟且偷生的行为十分羞耻。他们认为，这是北宋以来的儒学教化失败了，这其中一定缺少了最紧要的东西。刘子健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里写道：“朱熹从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著作里去寻找答案。大儒们的主要贡献都在形而上学领域。朱熹认为，忽视了形而上学理论是造成悲剧的致命错误。”

回到打破三教平衡的时间点上，儒学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没有关注人在精神层面上的问题。要真正超越佛、道两家，成为一个更优越的、更能庇佑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知识分子需要对物质世界、社会关系和宇宙进行观察思考，重新规范价值体系。刘子健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里总结朱熹的理论体系是发展了“理”和“气”这一对概念，“理”指存在于万世万物之中，永恒不变的非物质性原则，它赋予万事万物以形。“气”是物质性力量，它使万事万物呈现千差万别的实际面貌。第三个概念是“道”，它是一种充盈于天地万物之中的内在原则，但并不神秘，而是与人本身、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全体以及整个宇宙息息相关。对于朱熹学派来说，最重要的便是认知“道”，不懈地循“道”而行，使自己更为高尚，让“道”流行于天地之间。

理学在当时不是一枝独秀，但它最后能脱颖而出成为正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传播的力度。他们认为教育是觉悟普遍规律、感知自然、认识人类社会的手段。于是，道学的知识分子像传教士一样，从南宋经济的核心区域浙江、江西和福建，向偏远地区湖北、四川、湖南扩散，诲人不倦。

传教的载体就是书院。朱熹创建了书院4所、修复了包括白鹿洞书院在内的3所书院，前后在20所书院里讲课。即便他去世之后，他的弟子黄翰为了光大师传、传播理学，还创建了多所书院。弟子陈文蔚一生也讲学于丰城龙山书院、宜春南轩书院等多所书院。现在，我们发现书院的遗址大多数是风景优美的名胜，这其实是理学家们经过谋划的。理学的传播不是讲知识，而是道德的、价值观上的认可，它的目的是让人们提升自我修养，达到道德的进步，确立信仰和价值观。所以，为了营造出不关心世俗、修身自省的氛围，书院跟佛寺、道观类似，喜欢建在幽静而风光秀丽的山野里。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写“相与择胜地，立精舍”，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中写“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

南宋大儒们也不只在书院里带着学生静心读书，他们的教学无处不在，有时候是解答学生的提问，有时候是游学中的某次阐述，这些随机的智慧编辑成一本《近思录》，全是从农民、乡村生活、宗教活动、统治艺术这类士大夫、知识分子关心的“痛点”出发的解答，而且这本书非常适合科举考试，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科举参考书。为了跟教育水平更低的人群传播理念，理学知识分子甚至放弃了文学素养，他们中间不再出现文学大师。

南宋社会和知识分子中间有强烈改变现状的意愿，理学大儒形成了理论体系，有书院做载体，还注重简明易懂的传播方法，这些完全符合撩起人群追随和信仰的规律。理学派在士大夫和民间知识分子中声望日隆。但是，成为宋代的正统学说不能只靠“群众”们喜欢，走到最后是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结果。

1195年宁宗即位，受到权力争夺的波及，道学被定为是伪学，以这个为理由，推荐过朱熹和其他道学学者的宰相赵汝愚被流放。朱熹在1200年去世，他没有看到因为政治局势的又一次逆转，使得受到压迫的道学获得崇敬。1208年朝廷授予朱熹身后荣誉，称他的学术为正学，1212年，政府接受了朱熹为《论语》和《孟子》所做的注释。

蒙古人咄咄逼近，而且他们跟西夏、辽、金一样，也以中原文明体系的政权自居，还在北京修建了孔

《重新发现宋朝》

庙。朱熹学派成了南宋朝廷提振士气的工具，因为他们一直宣称北宋五大儒激活了儒学的血脉，而其中“二程”的学生杨时又把血脉传到了南宋，传给了朱熹学派。1237年，蒙古开科取士，南宋朝廷赞同朱熹学派的正统。1241年，在内忧外患之时，为了申明南宋在中原文明体系里的正当性，朝廷举行仪式宣布朱熹的理学为国家正统。

深远的影响

宋代的书院在物理上消失殆尽，可是精神长存。朱熹的理学成为国家正统，在小岛毅看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朝在宋初人们心中是一个理想王朝的模范，但是不久宋人开始摸索超越大唐的政治理论和皇权理论。如果说唐朝实体被黄巢消灭，那么唐朝的理念在朱子学立为正统时被消灭。中华文明从唐韵转向了漫长的宋调，朱熹的理学包括新儒学在当时是种新文化潮流，可一直影响到封建王朝的末期。这些理念和规范构成了我们最熟悉的“古代”是什么样子。

“孔孟之道”是宋代才有的说法。在宋之前的说法是“周孔之教”，“周”指的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从欧阳修寻找儒学本来面目的古文运动开始，孟子的地位一直在提高。欧阳修的继承人王安石把孟子从祀到孔庙，朱熹注《四书》《孟子》入经，成为显学。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写“人欲肆而天理灭”，后来他又强调“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必须“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这个理论的基础就是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认为人的欲望寡浅才能保持住善良的本性，多欲则会丧失善良的本性。

宗族社会也是在朱熹理学的传播过程中产生。朱熹理学强调《大学》，“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三纲领，具体实践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从前是统治者的守则，而理学把它扩大为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小岛毅分析，道学在长期以来是要应对新学和佛教禅宗两方面的挑战，禅宗逃避社会责任，而新学忽略自我修养。道学的解释系统里，“明德”就是天理，至善就是为天下国家做贡献，这是一个人的义务，也是最富有人性的人生。

对于那些没有做官的地方乡绅、知识分子来说，道学给他们指出了人生方向，致力于自己的宗族社会，也是对国家做贡献，因为国家秩序就是由单个的宗族组成的。其实在宋初，科举制本来就有打击世家大族的意味，但是有眼光的家族为了维持兴旺，就得给家族里的子弟提供读书的环境和经济支持，宗族又因为科举而紧密起来。范仲淹晚年在苏州设立义庄、欧阳修编纂了族谱，这些都是为了把自己因为科举和做官积累的资本传递给家族后代。重视宗族社会从理论上讲也有意义，是恢复古代礼制的手段。

宗族社会在宋代开始逐渐形成，朱熹理学兴起之后，更有完全按照朱熹的思想去经营家族的。比如徽州的宗族社会就依照的是朱熹嫡传“新安理学”的思想形成的。徽州宗族的族规、祖训是朱熹伦理思想的具体化，洁祠堂、修坟墓、孝父母、序长幼等，甚至承担国家义务都有明文规定“吾门粮差，各有定规，乃朝廷正务，不可慢也”。宗族活动的内容、程序和细节则遵照的是朱熹的《文公家礼》，族谱甚至明文规定“凡祭祀、一切仪节，谨遵朱子《家礼》”。朱熹在《家礼》里特别重视祠堂，“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南宋之后，徽州宗族兴修祠堂，并且逐渐成为宗族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徽州“祠堂林立”的根源。

理学对宋代的影响其实也可以从文学艺术上看得到，风格上从唐的热烈飞扬转到了宋代的内敛，以方寸之心去牢笼天地，在一件玩物、园林、景观里看到浩瀚宇宙。理学的“理气象”“性与情”“文与道”这些哲学品格进入道美学理，也让宋代美学有了思辨的基础。比如“气象”就是从道学转入了美学范畴，最初是形容人物精神面貌，后来用于形容山水、文章的整体风貌，用来形容各种艺术的风貌境界。“韵味”也是宋代标识明显的审美气质，指的是意味之美、意味之境。宋代文化转向内，崇尚淡泊，而韵味的最高境界，可以用朱熹的门生魏了翁的概括“无味之味至味也”。

4、《重新发现宋朝》的笔记-第11页

《重新发现宋朝》

普遍认为，尽管从军事威力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繁荣程度而言，宋朝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对折一下，宋朝正好处在中间点上。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在这个对折点的唐宋之交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最早提出这一观点，“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进一步阐释：“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500年。”

邓小南强调从唐到宋“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会变迁过程。都市景观的变化，最鲜明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唐代长安城坊格局井然，“坊”是居住区，四周有围墙，有两门或四门供人进出。一般人不准凿墙开设私门，也不准朝着大街开设店铺；“市”是交易区，日中击鼓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散市。宋代都城开封和临安则废除了坊市分割，允许面向大街开店，与民居混杂毗邻。城市居民“坊郭户”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法定的户籍管理分类。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之后完全取消，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市。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甚至评价，“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更深刻的背景，是一个新的阶层——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两宋时期偃武修文，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官体系。于是，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出身更多元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出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只有15%。处在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士人阶层，也是文明扩张中的重要一环。在朝为官的毕竟是少数，更多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渗透到民间，通过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之类的规定，甚至通过祭祀以及仪式中的戏曲、说唱，将知识、思想与信仰迅速传播，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而这些士人也是文化的旗手，其“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提升，风雅成为一时之风。

可以说，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朝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在佛教和道教的冲击下，宋代的儒学思想家们开始重新认识和理解古典思想，挖掘出了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使儒学理论更加平易近人，也因此真正深入到日常事务和私人生活。到了13世纪，儒学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进而重塑了整个社会，形成“传统中国”的典范。

诚然，在元朝统一了中国以后，宋代所代表的“近代化早春”就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回潮。不过，宋代政治理念、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仍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中，尤其是儒家的复兴。德国宋史学家迪特·库恩指出，许多脱胎于宋代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今天的人们为什么爱宋朝？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今天与宋朝的连接点，是一种“生活美学”。一方面，是当今的生活和艺术正发生“审美的泛化”“生活艺术化”，与此同时，“艺术生活化”，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日渐模糊。追本溯源，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里面，艺术与生活、创造与欣赏从来都是内在融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另一方面，则是“审美的升级”，部分由日本美学传递而来的大朴若拙的“侘寂之美”“匠人精神”，都能在宋代器物中找到源头，而宋的极简风格，又能和当代艺术精神相

《重新发现宋朝》

契合。

所以，当我们向自身文化寻找，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还是艺术与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都当推宋朝。特别是宋代士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通过儒家思想的一脉相承，一直为后世所追慕。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扬之水所说：“两宋是培养‘士’气的时代，前此形象与概念尚有些模糊的‘文人’‘士大夫’，由此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愈益变得丰富和具体。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和绘画，携手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

《重新发现宋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